补偿行为对道德违反者群体内疚、群体责任感知和群体羞耻的影响（亲社会行为专刊投稿）

李志爱[1] 徐梦思[3] 张丽[2]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系，广州 510006）（[2]上海体育大学心理学院，上海 200438）（[3]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西安 710062）

收稿日期：2023-06-29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32000737）。

[2]上海体育大学科研项目自然科学一般项目（2022XJ001）。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32100871）。

李志爱和张丽同为通信作者。

通信作者：李志爱，E-mail: Carolinelee0602@gmail.com

张丽，E-mail: zhangliswu@gmail.com

摘　要　以往研究主要从补偿受害者和修复关系角度考察内疚情绪的亲社会属性，而较少有实证研究从道德违反者角度来考察内疚的亲社会属性。本研究通过群体内疚情境考察了道德补偿对道德违反者道德情绪和认知的影响。实验一（$n = 213$）和实验二（$n = 105$）分别采用情景想象和人际互动范式，比较了无补偿、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条件下被试对内外群体道德违反行为的内疚情绪、责任感知和羞耻情绪的影响。实验三（$n = 128$）在非大学生群体上进一步检验了实验一和实验二结果的稳定性。三个实验结果一致发现，以无补偿为基线，自己补偿能够显著降低群体内疚和群体责任感知，且不会诱发群体羞耻；而第三方补偿虽然也可以降低群体内疚，但在程度上弱于自己补偿条件。同时，第三方补偿不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还诱发了群体羞耻。结果表明内疚诱发的补偿行为也会对内疚主体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是一种自我调适方式。这一发现扩展了我们对内疚亲社会属性的理解，揭示了内疚的双重影响，既关注和补偿受害者，也涉及对内疚主体自身心理状态的调节和恢复。
关键词　自己补偿，第三方补偿，群体内疚，群体责任感知，群体羞耻

1 引言

内疚和补偿一直是社会情绪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内疚是当具有道德动机的个体意识到自己处于道德上不可接受的状态时，所体验到的一种自责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负性情绪，进而诱发其补偿、道歉等亲社会行为(Baumeister et al.,1994; De Hooge et al., 2007; Izard, 1991; Yu et al., 2014)。当下有关内疚的研究主要从其对受损关系的修复和对受害者补偿的角度阐述内疚的亲社会属性(De Hooge et al., 2007; Yu et al., 2014)，较少从道德违反者的视角探讨内疚的亲社会属性。Baumeister 虽然提到内疚作为一种人际间的社会情绪(interpersonal emotion)，其诱发的亲社会行为除了补偿受害者和修复关系，理论上应该也有助于降低道德违反者的内疚情绪，但并未对该设想进行实验验证(Baumeister et al.,1994)。后续有关内疚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其对受害者的补偿和受损关系的修复 (e.g. Iyer et al., 2003; Yu et al., 2014)。然而，既然是一种人际间的社会情绪，对内疚的认识就不应该单方面关注其对受害者的补偿，也应从道德违反者角度来认识内疚，这样才能对内疚这一亲社会情绪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而，本研究希望能够从道德违反者的角度来理解内疚的亲社会属性，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内疚诱发的亲社会行为对道德违反者内疚情绪的影响。如果内疚诱发的补偿行为只是单方面“利他”于受害者，来自第三方的补偿也可以补偿受害者，那么第三方补偿是否可以代替道德违反者自己补偿？反之，除了“利他”于受害者，补偿行为如果还能“利己”于道德违反者自身，起到对道德违反者情绪的调节，那么第三方补偿可能就不能代替道德违反者自己补偿。本研究通过群体内疚来考察内疚主体自己补偿和第三方补偿对内疚主体道德情绪和道德认知的影响。

群体内疚是个体所属群体内他人对外群体做出了不道德伤害行为，个体基于群体成员身份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Doosje et al., 1998; Branscombe et al., 2004)。即，个体自身并没有参与内群体他人对外群体的伤害行为，但因为其与道德违反主体同属一个群体而体验到内疚情绪。“内疚的德国人”(German guilt)和“内疚的白人”(White guilt; Steele, 1990)代表了典型的群体内疚。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和社会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为群体内疚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Tajfel &Turner, 2004)。根据社会认同和社会分类理论，当个体将自己归属于并认同某个群体时，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就会受到群体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Turner et al., 1987)。即，通过共同的群体成员身份，个体将群体内其他成员的道德违反行为与自己相关联。这些理论共同解释了群体成员身份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这种纯粹基于群体身份差异而感知到的内疚差异就是群体内疚，也就是说，面对

同样的伤害行为时，伤害行为的实施者来自内群体通常会比来自外群体诱发道德违反者所属群体成员更强的内疚情绪 (Li et al., 2020)。

内疚主体自己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

群体内疚会诱发道德违反群体的补偿倾向和行为。群体内疚越强，他们支持补偿受害群体的意愿和行为也就越强(Brown & Cehajic, 2008; Manzi & Gonzalez, 2007)。例如，在群体伤害任务情景中，相比于外群体成员的道德违反行为，内群体成员的道德违反行为会让被试将更多的代币分给受害者 (Li et al., 2020)。内疚诱发的补偿行为除了补偿受害者，是否也会给内疚主体带来获益？根据自我宽恕模型(Hall & Fincham, 2005)，内疚可以诱发补偿行为，内疚主体可能会通过补偿行为来寻求宽恕和降低内疚，进而达到自我宽恕(Carpenter et al., 2014)。基于该理论，补偿行为既体现了内疚主体对受害者的亲社会属性，也会给内疚主体本身带来获益。那么，内疚主体自己补偿是否也能降低其感知到的群体内疚？

此外，要体验群体内疚，不仅需要个体认同自己所属群体 (Branscombe et al., 2002)，还需要个体接受自己所属群体实施了道德违反行为，即承认内群体需要为道德违反行为承担责任 (Branscombe et al., 2002; Iyer et al., 2004)。面对内群体的道德违反行为，责任感知意味着个体感知到自己作为道德违反群体中的一员，需要为内群体的道德违反行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Li et al., 2020)。这种基于共同群体身份而继承过来的道德责任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职责"和"道德义务"，这能驱使个体改变他们对受害者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倾向(Radzik, 2001)。譬如研究发现，责任感知同群体内疚体验呈正相关，个体越觉得内群体需要为道德违反行为承担责任，体验到的群体内疚情绪就越强烈(e.g., Iyer et al., 2004; Li et al., 2020) 。这都提示责任感知是群体内疚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基础 (e.g., Iyer et al., 2004; Li et al., 2020) 。鉴于责任感知在群体内疚产生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进一步检验道德补偿是否能够调节内疚主体对道德违反行为的责任感知，进而考察道德补偿影响群体内疚的心理机制。

第三方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

作为一种人际间的社会情绪，内疚诱发的补偿行为如果主要是为了补偿受害者以此来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那么来自第三方的补偿也可以补偿受害者，对内疚主体来说，第三方补偿应该等同于自己补偿，第三方补偿是否可以代替道德违反者自己补偿？ De Hooge（2012）关于第三方补偿对个体内疚的影响就支持了该观点(De Hooge, 2012)。在该研究中，De Hooge（2012）让第三方（朋友）代替内疚个体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发现第三方补

偿后的内疚与内疚个体自己补偿后的内疚没有显著差异。由此，De Hooge 认为第三方补偿完全可以代替内疚个体自己补偿 (De Hooge, 2012)。但该研究里面的第三方并非普遍意义上与内疚个体毫无关系的旁观者，而是内疚个体的朋友，这有可能放大了第三方补偿的效果。譬如，内疚个体可能认为朋友补偿等同于自己补偿。因而，本研究我们将“第三方补偿”定义为跟施害群体不相干的旁观者对受害者的补偿。如果第三方是旁观者，来自第三方旁观者的补偿是否也可以降低内疚主体的内疚？以及它可以代替内疚主体自己补偿么？

如果内疚后的利他行为只是为了补偿受害者，那么第三方补偿应该等同于自己补偿。如果内疚后的利他行为除了补偿受害者，还对内疚主体自身的情绪和认知等有影响，那么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对内疚主体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通过对自己补偿和第三方补偿分析比较发现，自己补偿包括利他行为和自我惩罚两个部分，而第三方补偿对受害者的利他行为不需要内疚主体付出任何代价。正是因为第三方补偿缺失对内疚主体的惩罚，所以其对内疚主体情绪的影响会弱于内疚主体自己补偿。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是个体自我和超我冲突的产物，个体通过寻求承受痛苦来缓解无意识中的内疚倾向(Freud, 1929)。内疚作为一种“自我反省”式的道德情绪，对道德违反行为的谴责才是内疚产生的根源，个体在违反准则后产生的内疚感要靠自我惩罚才能缓解(Kouchaki et al., 2014)。比如，有意使自己承受损失或者伤害的行为，包括拒绝享乐、自愿损失金钱、自愿承受伤害等(朱睿达 等, 2014; Watanabe & Ohtsubo, 2012)。所以本研究通过比较自己补偿和第三方补偿对内疚主体情绪的调节来进一步验证内疚诱发的亲社会属性不仅仅局限于受害者，对道德违反违反者自身也是有益的。

第三方补偿可能会诱发群体羞耻

当内群体做出了不道德伤害时，除了内疚，群体成员可能还会体验到羞耻。群体羞耻(group-based shame)是当内群体的道德违反行为被公开曝光，或个体感知到群体负面消极的本质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Branscombe et al., 2004；Haslam et al., 2000)。相比于群体内疚对不道德行为的关注，群体羞耻则更为关注不道德行为对自我的影响(Tangney, 2003)。具体而言，内疚通常会促使内疚主体对不道德行为进行反省，进而感到自责并采取各种修复行为，因而内疚更为具有建设性导向(Bedford & Hwang, 2003)。正如前文所述，内疚会促使内疚主体采取各种补偿行为来挽回错误，减轻对受害者的伤害，并修复破损的人际或者群际关系 (e.g., Baumeister et al., 1994)。内疚通常不会影响内疚主体对自我的评价，而羞耻则会让群体成员因群体的不道德行为而产生消极自我评价，产生被贬低感和无价值感(Eisenberg, 2000)，从而倾向于回避(Teroni & Deonna, 2008)。因而相比于内疚，羞耻更为关

注不道德行为对自我的伤害，即不道德行为是否会影响其对自我的评价和否定。个体只要觉得自我形象受损了，不管是觉得自己可能被外界贬低，或在重要他人眼里丧失了相应地位，就会体验到羞耻情绪，而无需必然承担特定道德违反行为的责任(Bedford & Hwang, 2003)。根据信息威胁理论，羞耻是个体对自我的保护和对社会形象的修复，来自他人潜在而非实际的贬低就足以诱发羞耻(Robertson et al., 2018)。第三方补偿条件下，内疚主体需要面临道德违反行为可能被他人知晓和评判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担忧以及强烈的社会威胁感，这种潜在的被第三方知晓内群体的不道德行为，以及被第三方负面评判的风险可能会触发群体羞耻的产生(Robertson et al., 2018)。而在自己补偿条件下，内疚主体不用担忧道德违反行为可能会暴露给第三方，也就不用担心他人对自我的负面评价，因而我们预期内疚主体自己补偿不会诱发群体羞耻，而第三方补偿可能会诱发群体羞耻情绪。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通过三个实验来检验群体内疚的亲社会属性不仅仅局限在受害者，还可以降低道德违反者所属群体成员（群体内疚的内疚主体）的内疚情绪。其中，实验 1 采用 2（组别：内群体 *vs.* 外群体）× 3（补偿类型：无补偿 *vs.* 第三方补偿 *vs.* 自己补偿）的被试内实验设计，通过情景想象方法诱发群体内疚，来初步考察补偿行为对群体内疚情绪的影响。实验 2 采用基于群体的人际互动范式在实验室环境下诱发群体内疚，并在实验 1 的基础上进一步定量化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的额度，排除可能由二者补偿量的差异导致补偿效果的差异。实验 3 采用贴近日常生活情景的材料，在非大学生群体被试上对内疚的亲社会属性进行检验。我们预期，以无补偿为基线，内群体成员自己补偿能够降低群体内疚和群体责任感知，且不会诱发群体羞耻；第三方补偿不能替代自己补偿，第三方补偿对内疚情绪和责任感知的影响可能弱于自己补偿，且会诱发群体羞耻。

2 实验 1

2.1 方法

2.1.1 被试

采用 G*Power 对样本进行估计，在保证得到中等效应量（$f = 0.25$），设定 α 为 0.05，并且检验效能为 0.95，至少需要 35 人 (Faul et al., 2009)。本实验招募 213 名在校大学生，平均年龄 18.07 ± 1.03 岁，女生 112，男生 101 名。被试是四个班级的大一新生，非心理学专业，在下课前 10 分钟扫描问卷星的二维码进行问卷填写，告知被试这是一个公共卫生态度问卷，主要是了解大学生对公共卫生违反行为的态度，并在问卷结束后跟学生解

释测验目的。所有被试视力和矫正视力正常，均没有精神类疾病或正在服用精神疾病类药物，之前未参加过类似的实验。本实验获得本校伦理委员会的许可，被试完成任务可获得一定的报酬。

2.1.2 实验设计

采用 2（组别：内群体 *vs.* 外群体）× 3（补偿方式：无补偿 *vs.* 第三方补偿 *vs.* 自己补偿）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是补偿后被试主观报告的内疚、羞耻以及因伤害行为而感知到的责任的强度。

2.1.3 实验材料

基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本实验选取了贴近学生生活的道德违反情景进行情景材料编写，来考察被试面对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给他人造成的伤害，第三方的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

材料背景：*学校组织全校的学生去公园游玩，老师提前告知大家不要在公园内随意丢垃圾，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游玩过程中你并没有乱扔垃圾，但仍有一些同学乱丢垃圾，需要环卫工人加班很久才能清洁干净。*

内群体三种不同补偿条件问题示例：

无补偿条件问题示例：*如果是[你的同班同学]乱丢垃圾导致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大增，这个时候你的内疚情绪、羞耻情绪和感知到的责任是多少？*

第三方补偿条件问题示例：*如果是[你的同班同学]乱丢垃圾导致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大增，[后来有志愿者帮着环卫工人一起清理了垃圾]，这个时候你的内疚情绪、羞耻情绪和感知到的责任是多少？*

自己补偿条件问题示例：*如果是[你的同班同学]乱丢垃圾导致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大增，[后来你帮着环卫工人一起清理了垃圾]，这个时候你的内疚情绪、羞耻情绪和感知到的责任是多少？*

11 点李克特评分问题示例：

你为此感到内疚的程度？0=一点都不内疚，10=非常内疚。

你为此感到羞耻的程度？0=一点都不羞耻，10=非常羞耻。

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你要为环卫工人所承受的伤害承担责任？0=没有责任，10=非常大的责任。

上述问题为内群体三种不同补偿条件的问题示例，在外群体条件下，“你的同班同学”被替换为“其他班的同学”。在呈现材料背景后，逐一呈现六种条件下的问题：“内

群体-无补偿”，“外群体-无补偿”，“内群体-第三方补偿”，“外群体-第三方补偿”，“内群体-自己补偿”，“外群体-自己补偿”。针对每个具体的问题，被试都需要在 11 点李克特量表评估感受的强度。实验一是在四个班级收的数据，为了避免固定顺序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班级都重新调整了条件呈现的顺序。整个测试过程都要求学生独自完成，不能讨论，避免被试之间的相互影响。

2.2 结果与小结

2.2.1 数据分析

操作检验：为了明确被试能够将“自己班级”识别为内群体，同时将“其他班同学”识别为外群体，我们通过问卷星向原有被试发放社会距离量表(a modified Inclusion of Others; Aron et al., 1992)补充收集了被试对自己班级和其他班级的心理距离（7 点量表，从 1 到 7，数值越大，代表相应的心理距离也越近）。补充发放 71 份测试，回收 56 份。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被试与自己班级的心理距离(5.00 ± 0.18)显著近于其他班级(2.42 ± 0.13)，t (55) = 14.09，$p < 0.001$，Cohen’s d = 2.24，提示被试在群体身份分类上，会明确将自己班级归为内群体，而其他班级归为外群体。

根据研究目的和假设，本实验采用 SPSS 21.0 分别对内疚情绪、责任感知和羞耻情绪进行 2（组别：内群体 *vs.* 外群体）× 3（补偿类型：无补偿 *vs.* 第三方补偿 *vs.* 自己补偿）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在三个因变量上，所有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显著（见表 1, 表 2 和图 1）。内外群体在内疚情绪、责任感知和羞耻情绪下的差值被定义为群体内疚、群体责任感知和群体羞耻。

表 1 三个实验的描述性结果

	无补偿		第三方补偿		自己补偿	
	内群体	外群体	内群体	外群体	内群体	外群体
实验一						
内疚	6.93（0.16）	5.36（0.16）	5.75（0.15）	4.54（0.16）	4.27（0.18）	3.56（0.17）
责任感知	6.01（0.15）	5.20（0.15）	5.60（0.14）	4.52（0.16）	4.97（0.17）	4.45（0.18）
羞耻	5.98（0.15）	5.68（0.13）	6.97（0.15）	5.36（0.16）	4.48（0.18）	4.26（0.16）
实验二						
内疚	7.19（0.05）	5.27（0.06）	6.23（0.05）	4.55（0.05）	5.26（0.07）	3.79（0.05）
责任感知	7.36（0.07）	5.37（0.05）	6.79（0.06）	4.93（0.06）	5.69（0.04）	4.31（0.06）
羞耻	5.59（0.05）	5.51（0.06）	6.72（0.08）	5.26（0.07）	4.90（0.07）	4.80（0.08）
实验三						
内疚	6.34（0.13）	4.38（0.17）	5.13（0.11）	3.59（0.14）	3.95（0.11）	2.81（0.15）
责任感知	5.70（0.16）	4.52（0.15）	5.16（0.11）	4.03（0.17）	4.24（0.15）	3.42（0.16）
羞耻	5.67（0.18）	5.43（0.17）	6.82（0.16）	5.13（0.18）	4.63（0.17）	4.48（0.1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表 2 三个实验的差异效应检验结果

	组别主效应	补偿类型主效应	交互作用
实验一			
内疚	173.51***	133.95***	12.58***
责任感知	94.99***	29.96***	6.40**
羞耻	55.78***	95.04***	34.41***
实验二			
内疚	2035.53***	341.56***	14.16***
责任感知	1648.53***	228.36***	21.86***
羞耻	146.61***	115.23***	68.22***
实验三			
内疚	295.18***	100.40***	9.12***
责任感知	163.37***	58.11***	3.78*
羞耻	56.74***	53.69***	36.41***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2.2.2 第三方补偿降低群体内疚程度弱于自己补偿

如图 1A 所示，三种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均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内疚($ps < 0.001$)，表明内外群体主效应显著，实验情景在三种补偿条件下均可以诱发群体内疚。对三种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的内疚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如图 1B 所示，第三方补偿条件下的群体内疚(1.21 ± 0.13)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1.57 ± 0.15)，$F(1, 212) = 4.44$，$p = 0.04$，$\eta^2_p = 0.02$，表明第三方补偿可以降低个体对内群体道德违反行为的群体内疚；但仍然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0.71 ± 0.12)，$F(1, 212) = 9.58$，$p = 0.002$，$\eta^2_p = 0.04$，表明第三方补偿在降低群体内疚上无法完全代替自己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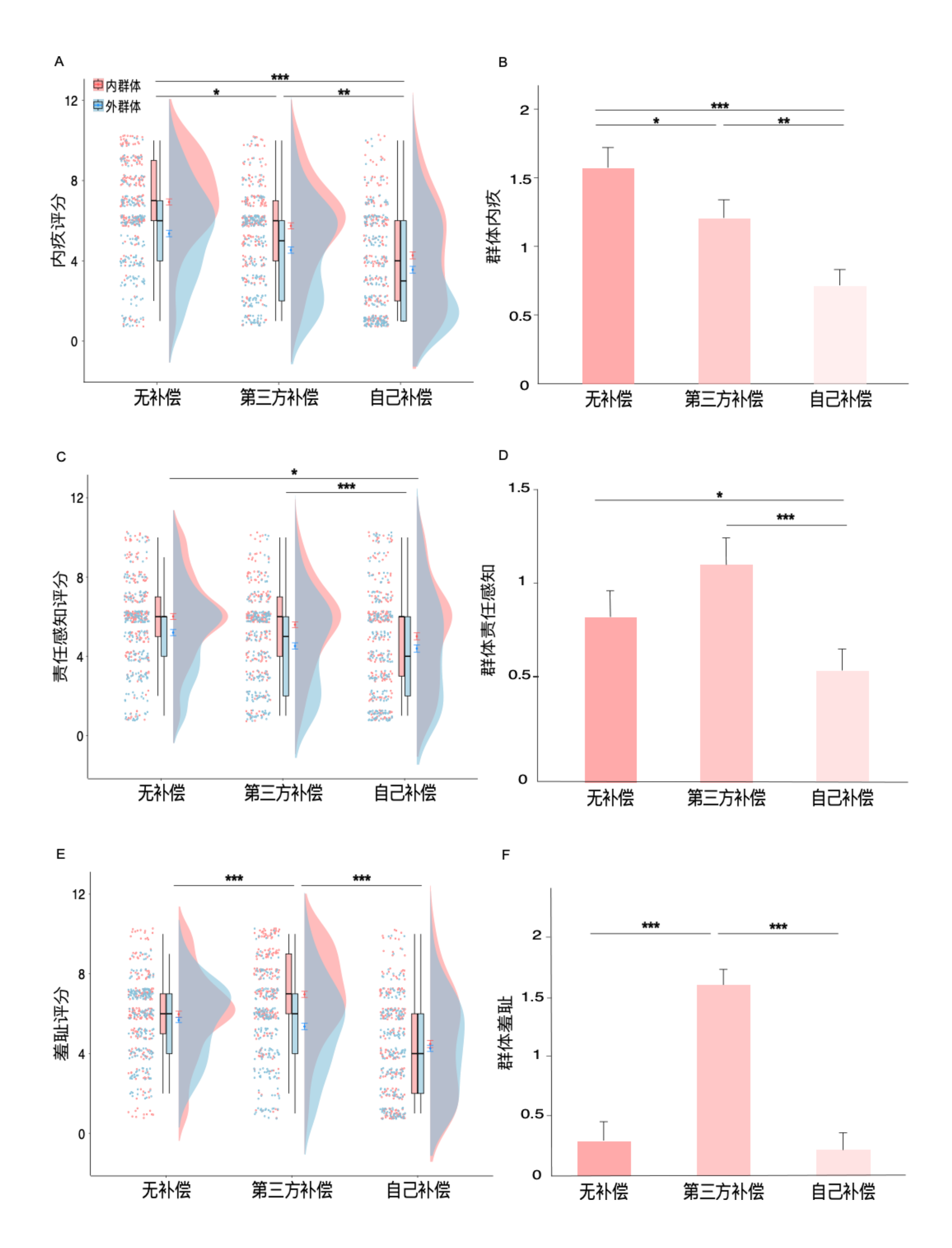


图 1 实验一结果。（A）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内疚评分；（B）对内疚评分在三种补偿类型下的差值进行分析显示，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内疚小于无补偿条件而大于自己补偿条件；（C）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责任感知评分；（D）对责任感知评分在三种补偿条件下的差值进行分析显示，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责任感知并未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而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E）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羞耻评分；（F）对羞耻评分在三种补偿条件下的差值进行分析显示，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羞耻显著大于无补偿和自己补偿。***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2.2.3 第三方补偿不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

如图 1C 所示，三种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均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责任感知($ps < 0.001$)，表明内外群体主效应显著，实验情景在三种补偿条件下均可以诱发群体责任感知。对三种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的责任感知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如图 1D 所示，第三方补偿条件下的群体责任感知(1.08 ± 0.13)并未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0.82 ± 0.13)，$F(1, 212) = 2.39$，$p = 0.13$，表明第三方补偿未能降低个体对内群体道德违反行为的责任感知；且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0.53 ± 0.11)，$F(1, 212) = 12.47$，$p = 0.001$，$\eta^2_p = 0.06$，表明第三方补偿在降低群体责任感知上不能代替自己补偿。

2.2.4 第三方补偿会诱发群体羞耻

如图 1E 所示，第三方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会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个体更强的羞耻情绪，$F(1, 212) = 157.67$，$p < 0.001$，$\eta^2_p = 0.43$，表明第三方补偿能诱发群体羞耻（见图 1F）；无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条件之间的羞耻情绪感受边缘显著，$F(1, 212) = 3.40$，$p = 0.07$，$\eta^2_p = 0.02$；自己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条件之间的羞耻情绪感受不显著($p > 0.05$)，提示无补偿和自己补偿条件不会诱发群体羞耻。

2.2.4 小结

实验一初步考察了自己补偿和第三方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如果内疚后的道德补偿只是为了补偿受害者，那么对内疚主体来说，第三方补偿应该等同于内疚主体自己补偿。反之，如果内疚主体也能从补偿行为中获益，那么第三方补偿就不能代替内疚主体自己补偿。结果发现相比于无补偿，内疚主体自己补偿不仅可以降低群体内疚，还可以降低群体责任感知，且不会诱发群体羞耻；第三方补偿降低群体内疚的程度弱于内疚主体自己补偿，且不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还会诱发群体羞耻。上述结果提示，内疚诱发的补偿行为不仅对受害者有益，同时也对内疚主体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内疚主体对自身内疚情绪的调节，是内疚主体自我调适的一种方式。

3 实验 2

实验一对研究问题做了初步探索，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实验一中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的额度是没有定量的，所以不能排除是两者额度的差异才导致补偿后的内疚有差异。为了排除额度差异可能对结果的影响，实验二会对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的额度进行量化。其次，实验一中的道德违反行为发生在一个公开暴露的情景中，本身就更易诱发群

体羞耻，无补偿条件下群体羞耻情绪的边缘显著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实验一中第三方是志愿者身份，这种具有道德感的身份属性会让个体在自我比较中感到被贬低和无价值感，从而更易感到羞耻。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验二一方面要对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的额度进行量化，另一方面要控制好道德违反行为的发生情景以及第三方的身份，来排除可能的无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实验二通过改良版的基于群体的人际互动范式在实验室环境下诱发群体内疚，并考察第三方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实验二会量化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的金额，明确第三方补偿的额度跟自己补偿的额度是等量的，来排除补偿额度差异导致内疚差异的可能性。此外，实验二中的道德违反行为发生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下，且第三方的身份跟被试一样是普通大学生，有助于降低因为任务情景设置本身而诱发群体羞耻的可能性。实验二假设，在对无关变量进行控制后，第三方补偿可以降低群体内疚，但不能降低内群体成员对伤害行为的责任感知，依然会诱发内群体成员的群体羞耻。

3.1 方法

3.1.1 被试

使用 G-Power 3.1 对该实验的样本量进行估计，在保证得到中等效应量($f = 0.25$)，设定 α 为 0.05，至少需要 35 名被试才能达到 95% (1-β)的统计检验力(Faul et al., 2009)。本实验招募 108 名在校大学生，其中 1 名被试因为临时有事终止实验、1 名被试因为不相信实验情景和 1 名被试在分组检验中认同外群体而被删除。最终为 105 名有效被试，年龄为 21.25 ± 1.73 岁，男女比例均衡，均为右利手，无精神疾病史或服用精神类药物史。实验前明确告知被试其被试费由基础被试费和实验中某一轮的金钱分配收益共同组成。所有被试在实验开始前均需签署知情同意书，该实验已获得本校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同意。

3.1.2 实验设计

实验二的实验设计同实验一，仍采用 2（组别：内群体 *vs.* 外群体）× 3（补偿方式：无补偿 *vs.* 第三方补偿 *vs.* 自己补偿）的被试内实验设计。但实验二中对自己补偿和第三方补偿的额度进行了量化，自己补偿是内群体成员自己决定将 20 元代币中的多少补偿给受害者，第三方补偿实际使用数据就是内群体成员自己补偿的数据，这样单个被试内自己补偿和第三方补偿之间就不存在补偿额度差异。

3.1.3 实验流程

实验二改良了已有的基于群体的人际互动范式(Li et al., 2020)，在实验室环境下检验第三方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实验包含 2 个角色，角色 A 和角色 B，每个角色分别有 6 名玩家。角色 A（被试）的 6 名玩家会进行一个猜点游戏，如果游戏失败，那么 B 角色（受

害者）的 6 名玩家就需要接受噪音刺激，由此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并让被试或者第三方来补偿受害者。关于第三方，给被试的指导语是“*因为我们实验人数较多，倘若个别被试不来参加实验将导致整个实验无法进行，所以实验者额外招募了 3 名替补。如果角色 A 和角色 B 的 6 名玩家都准时到达，那么这 3 名替补就可以以第三方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对受害者的补偿*”。实际上不存在个别被试不来的情况，与实验中的受害者一样，第三方也是虚拟被试。

流程概述。本实验每次招募 6 名互不相识的被试。当 6 名被试都到达实验室后，主试会告知他们（她们）已经被提前分配到了 A 角色，而另一个房间的另外 6 名玩家（虚拟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了 B 角色（受害者）。该互动游戏任务总共包括两个阶段（图 2）：

图 2 群体互动范式流程图。 第一排为角色 A（被试），第二排为角色 B（假被试）。第一阶段是为了在实验室环境下形成内外群体，其中（1）被试到达；（2）分组；（3）形成组认同度。第二阶段通过点估计任务诱发群体内疚，并考察自己/第三方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

（1）阶段一，新建小组。A 角色的六名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黄队和蓝队，每组 3 个成员。之后每个小组需要完成一个冬季困境逃生的群体讨论任务，该操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被试增强对内群体的认同度(Gaertner et al., 1990; Johnson & Johnson, 1991)，在实验室环境下形成内群体和外群体(Johnson & Johnson, 1991)。为了检验内群体和外群体是否成功建立，被试需要完成两个检验量表，一是修订版社会距离量表，用于测量被试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心理距离（7 点量表，从 1 到 7，数值越大，代表相应的心理距离也越近），二是六项社会认同度量表(Falk et al., 2014)，用于测量被试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认同感。此外，A 角色的 6 名被试还被告知，另一个房间的 6 个 B 角色玩家也跟他们一样被随机分成了 2 组，并进行了讨论任务。

（2）噪声校准。如果被试任务失败，那么受害者就需要接受噪音刺激。实验中要求被试也体验噪音刺激，以便他/她更相信实验操作并清楚地体验不同强度的噪音水平。噪声校准从低噪声开始逐渐增加噪音刺激的强度，直到参与者报告不愉快程度为 7 的噪音水平。

（3）阶段二，点估计任务。被试与 2 个组内成员或者 2 个组外成员一起搭档完成一个多轮的点数估计任务，他们的任务表现决定了 B 角色是否会受到噪音刺激，并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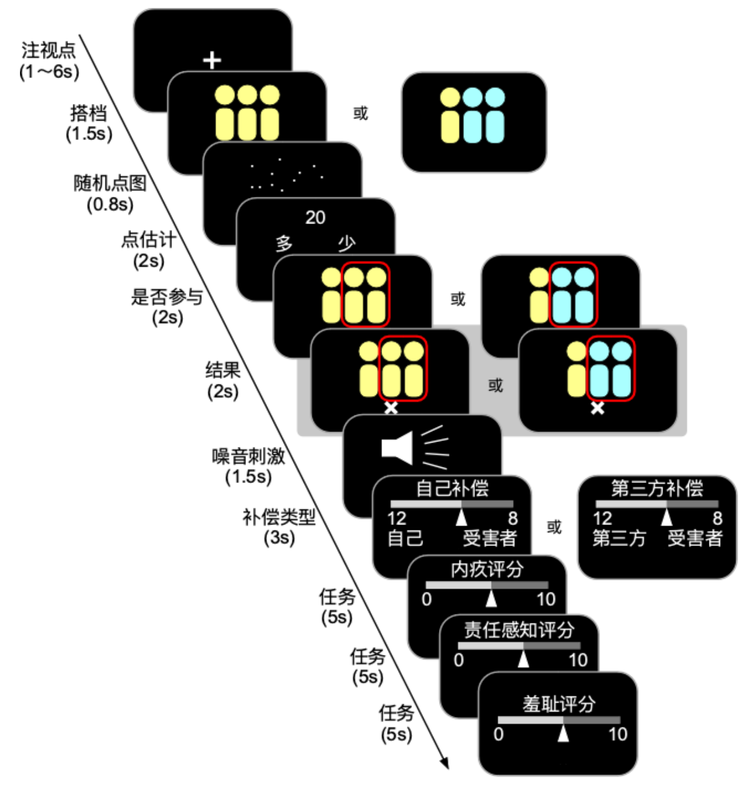


图 3 点估计任务流程图

具体的实验流程（图 3）为：首先，屏幕中央会呈现一个注视点，之后被试会得知（图 3 中最左侧人物代表被试）本轮跟他搭档的两个成员是来自组内（“黄队”）还是组外（“蓝队”）（见图 3 中中间和最右侧两个人物）。接下来，屏幕上会呈现一些随机分布的点，被试和其他两位搭档需要快速估计点的个数，然后将估计的数值跟之后呈现的参考值（见图 3 中的 20）进行比较，若觉得估计的点数比这个参考值多，就选“多”，反之则选择“少”。我们明确告知被试，点估计任务的平均正确率是 75%，要求被试认真做任务。之后，系统会从三人的点判断选择中，通过红框随机抽取两人的选择来代表这一组的任务表现。如果抽取的两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填充试次），一个“√”会呈现在屏幕上，表示本轮任务成功，B 角色不用听噪音，本轮试次结束；如果选取的两个结果中有一个错误或两个都错，那么，屏幕将会呈现“×”，表示本轮任务失败，系统会从 2 个 B 角色小组

中随机抽取一个小组来接受噪音刺激。这样做错的试次就包括 4 种情况：被试自己的点判断没有被选择代表组结果（观察条件），只有两个组内成员或者组外成员的点判断被选择代表组结果；参与条件则是被试自己的点判断和另外一个内群体成员或者外群体成员的点判断被选择代表组结果。实验中只关注观察条件下内群体成员任务失败和外群体成员任务失败造成的内疚差异，因为在观察条件下能检验到纯粹因为群体身份差异而感知到的内疚差异。即，面对同样的伤害行为，被试仅仅因为伤害实施者是否与自己属于同一个群体而感知到不同水平的内疚。B 角色接受噪音刺激后，被试有机会在自己和受害者之间分配 20 元代币（自己补偿条件），或等待第三方补偿受害者（第三方补偿条件），或者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无补偿条件）被试直接在李克特 11 点量表（0 = 没有，10 = 非常强烈）上评估自己的内疚情绪、责任感知强度和羞耻情绪。内疚、责任感知和羞耻的测量顺序也在试次之间进行平衡。做对和参与条件仅作为填充试次让实验情景更真实合理，不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关注和分析的是观察条件下点估计任务失败的这 6 种情况：2（组别：内群体 *vs.* 外群体）× 3（补偿方式：无补偿 *vs.* 第三方补偿 *vs.* 自己补偿），为实验试次。任务共有 78 个试次，其中，实验试次 48 个（每个条件 8 个试次），顺序以伪随机方式呈现，被试自己补偿的试次出现三次之后才会呈现第三方补偿的试次。此外，我们的实验程序设置了四条伪随机序列，根据被试的实验编号来呈现相应的序列，以此来避免条件间的干扰。

3.2 结果与讨论

3.2.1 数据分析

同实验一。在三个因变量上，所有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显著（见表 1 和表 2）。

3.2.2 操作检验

内外群体操作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被试与内群体的心理距离(5.23 ± 0.12)显著近于外群体(2.97 ± 0.11)，$t\,(104) = 14.20$，$p < 0.001$，Cohen’s $d = 1.91$；对内群体的认同度(4.45 ± 0.06)也显著高于外群体(3.08 ± 0.07)，$t\,(104) = 14.72$，$p < 0.001$，Cohen’s $d = 2.01$，表明内外群体操纵成功。

3.2.3 第三方补偿降低群体内疚程度弱于自己补偿

如图 4A 所示，三种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均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内疚($ps < 0.001$)，表明内外群体主效应显著，实验情景在三种补偿条件下均可以诱发群体内疚。对三种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的内疚差异进行比较发现，第三方补偿条件下的群体内疚(1.68 ± 0.06)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1.92 ± 0.07)，$F\,(1, 104) = 7.21$，$p = 0.008$，$\eta^2_p = 0.07$，表明第三方补偿可以降低个体对内群体道德违反行为的群体内疚；但仍然显著大于

自己补偿条件(1.47 ± 0.06)，$F(1, 104) = 6.61$，$p = 0.01$，$\eta^2_p = 0.06$，表明第三方补偿在降低群体内疚上无法完全代替自己补偿（见图 4B），同实验一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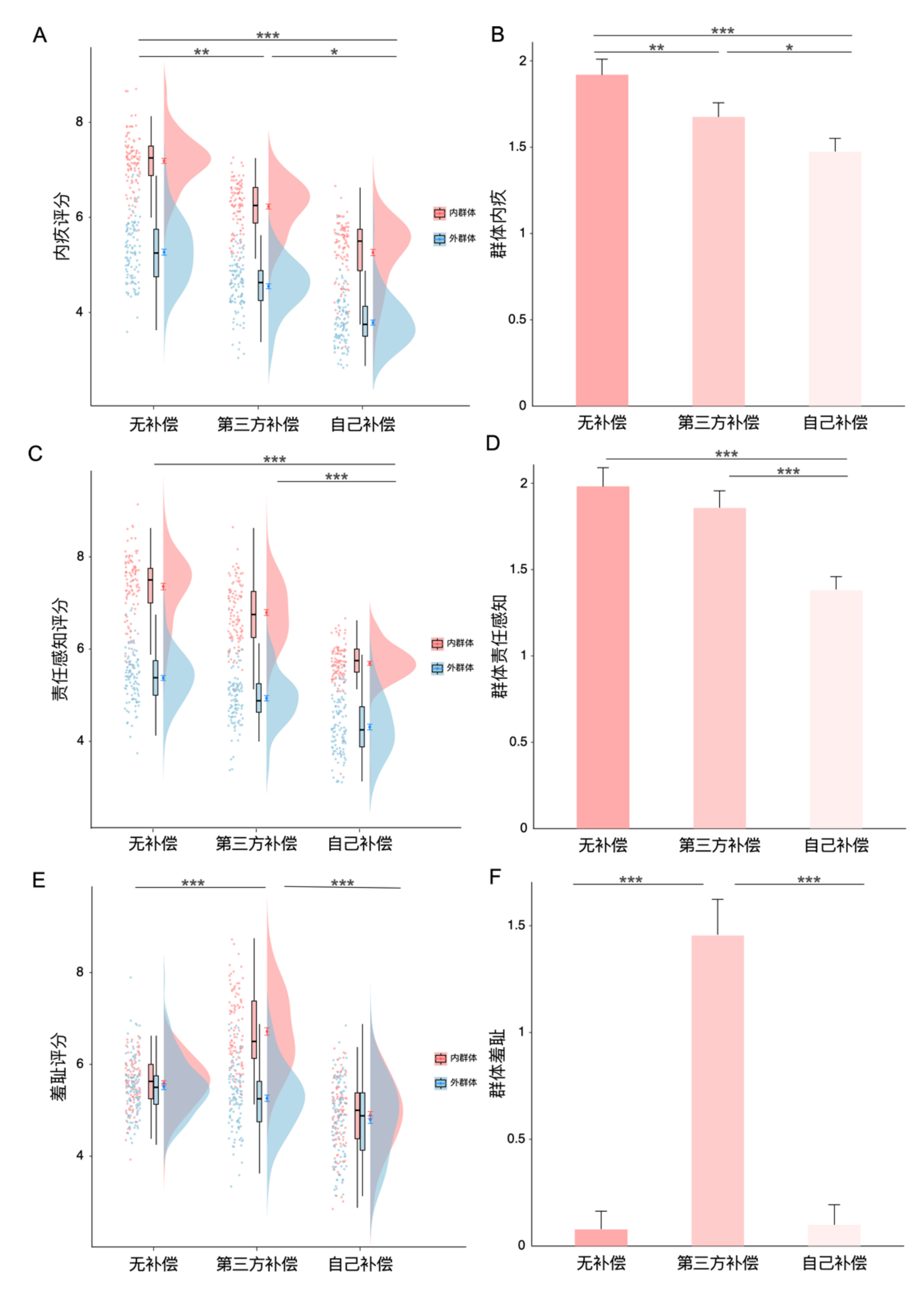


图 4 实验二的结果与实验一一致。（A）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内疚评分；（B）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内疚小于无补偿条件而大于自己补偿条件；(C) 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责任感知评分；（D）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责任感知并未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而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E) 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羞耻评分；（F）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羞耻显著大于无补偿和自己补偿。***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3.2.4 第三方补偿未降低群体责任感知

如图 4C 所示，三种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均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责任感知($ps < 0.001$)，表明内外群体主效应显著，实验情景在三种补偿条件下均可以诱发群体责任感知。对三种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的责任感知差异进行比较发现，第三方补偿条件下的群体责任感知(1.86 ± 0.07)并未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1.98 ± 0.08)，$F(1, 104) = 1.87$，$p = 0.17$，表明第三方补偿未能降低个体对内群体道德违反行为的责任感知；却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1.38 ± 0.06)，$F(1, 104) = 25.31$，$p < 0.001$，$\eta^2_p = 0.20$，表明自己补偿可以降低其对伤害行为的责任感知，第三方补偿在降低群体责任感知上不能代替自己补偿（见图 4D），同实验一一致。

3.2.5 第三方补偿能诱发群体羞耻

数据模式跟实验一基本一致，如图 4E 和 4F 所示，只有在第三方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才会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羞耻情绪，$F(1, 104) = 136.39$，$p < 0.001$，$\eta^2_p = 0.57$，表明在实验室环境下，第三方补偿能够诱发内群体成员的羞耻情绪。在控制了实验情景和第三方的身份后，我们发现无补偿条件下群体羞耻情绪不再显著，说明了实验情景控制的有效性。

3.2.6 小结

实验二重复了实验一的结果。以无补偿为基线，自己补偿能够显著降低群体内疚和群体责任感知，且不会诱发群体羞耻情绪；第三方补偿降低群体内疚的程度弱于自己补偿。同时，第三方补偿不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还会诱发群体羞耻。

实验二采用基于群体的人际互动范式在实验室环境下诱发了群体内疚，一方面可以多次重复测量不同补偿方式对群体内疚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优化了任务情景，实验室环境下的道德违反行为不是发生在公开暴露的情景中，可以降低情景本身诱发群体羞耻的可能性。实验二无补偿条件下的群体羞耻情绪不再边缘显著，也说明了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实验二对第三方补偿和自己补偿的额度进行了量化，来避免因为补偿额度差异导致的补偿效果差异。总的来说，在同样的补偿强度下，第三方补偿降低内疚的效果弱于内群体成员自己补偿。综上所述，实验二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内疚的亲社会属性不仅仅适用于受害者，内疚主体本身也能通过道德补偿来调节自身的内疚情绪。即内疚主体在面对内群体的道德违反行为，会通过补偿行为来获得宽恕和减轻内疚的情绪负担。

4 实验 3

4.1 方法

4.1.1 被试

采用 G*Power 对样本进行估计，在保证得到中等效应量（$f = 0.25$），设定 α 为 0.05，并且检验效能为 0.95，至少需要 35 人 (Faul et al., 2009)。通过问卷星和发放纸质版问卷，本实验共招募 128 名被试，职业主要为中学教师和国企员工,平均年龄 32.33 ± 0.77 岁，女性 67 名，男性 61 名。所有被试视力和矫正视力正常，均没有精神类疾病或正在服用精神疾病类药物，之前未参加过类似的实验。本实验获得本校伦理委员会的许可，被试完成任务可获得写有感谢的卡片以及一份小礼物。

4.1.2 实验设计

同实验一和实验二。

4.1.3 实验材料

本实验选取了贴近日常生活的道德违反情景进行情景材料编写，来考察普通大众面对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给他人造成的伤害，第三方的补偿对群体内疚的影响。

材料背景：单位组织去沙滩游玩，*沙滩旁边的告知提示上明确告知不要随意在沙滩上乱扔垃圾，并希望能在游玩结束的时候带离垃圾。游玩过程你并未往沙滩上仍垃圾，但你的同事仍将垃圾随意丢在沙滩上，其中包括各种果皮纸屑和酒瓶，这不仅污染了环境，也需要环卫工人加班很久才能清理干净。*

内群体和外群体三种不同补偿条件问题示例同实验一一致，只是内群体条件下，将“你的同班同学”调整为：“你的同事”，在外群体条件下，将“你的同事”调整为“其他单位的人”。

4.2 结果与讨论

4.2.1 数据分析

同实验一实验二。在三个因变量上，所有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显著（见表 1 和表 2）。

4.2.2 操作检验

内外群体操作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被试与内群体的心理距离(4.17 ± 0.11)显著近于外群体(2.52 ± 0.12)，$t\,(127) = 11.51$，$p < 0.001$，Cohen’s $d = 1.27$，表明被试在群体身份分类上能够明确区分内外群体。

4.2.3 第三方补偿降低群体内疚程度弱于自己补偿

如图 5A 所示，三种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均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内疚($ps < 0.001$)，表明内外群体主效应显著，实验情景在三种补偿条件下均可以诱发群体内疚。对三种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的内疚差异进行比较发现，第三方补偿条件下的群体内疚(1.53 ± 0.13)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1.95 ± 0.16)，$F(1, 127) = 4.46$，$p = 0.04$，$\eta^2_p = 0.03$，表明第三方补偿可以降低个体对内群体道德违反行为的群体内疚；但仍然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1.14 ± 0.14)，$F(1, 127) = 4.86$，$p = 0.03$，$\eta^2_p = 0.04$，表明第三方补偿在降低群体内疚上无法完全代替自己补偿（见图 5B），同实验一实验二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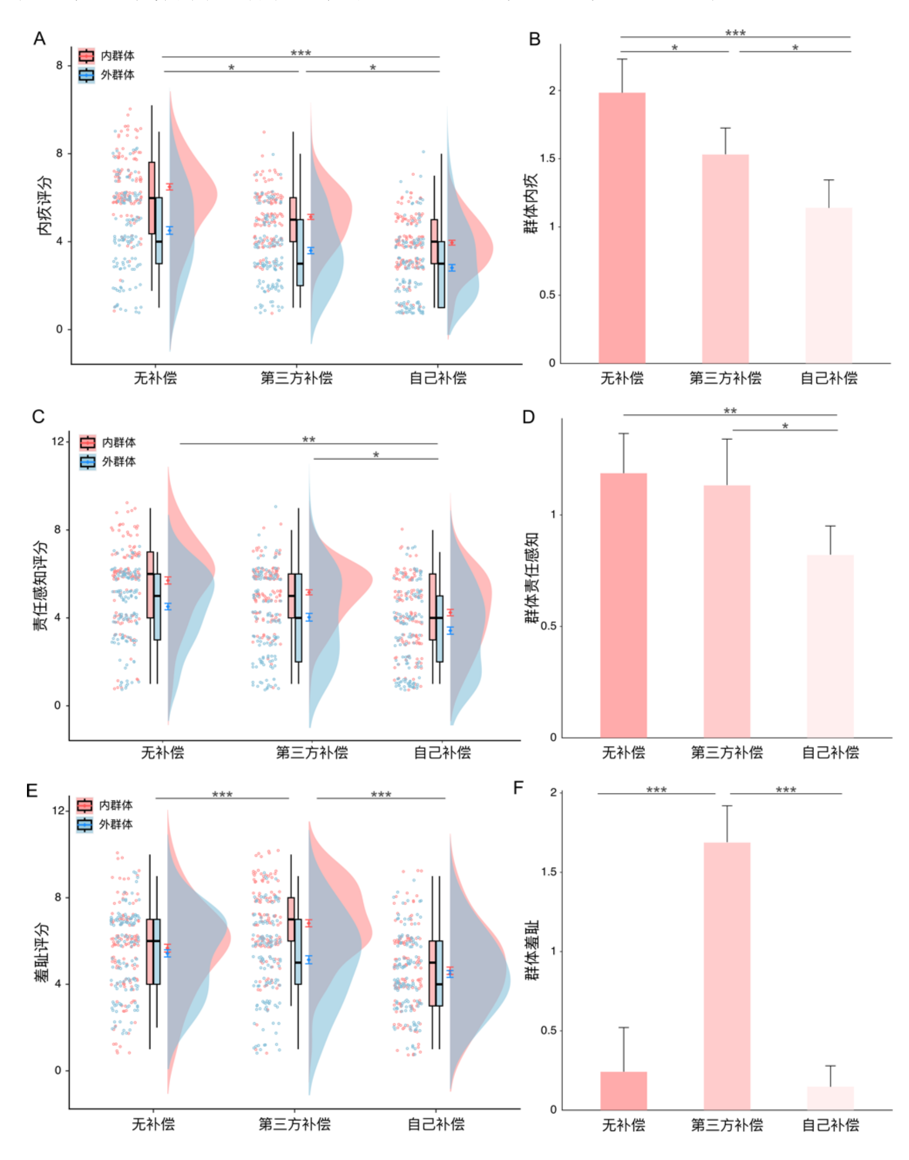


图 5 实验三的结果与实验一和实验二一致。（A）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内疚评分；（B）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内疚小于无补偿条件而大于自己补偿条件；（C）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责任感知评分；（D）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责任感知并未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而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E）组别和补偿类型共同调节了羞耻评分；（F）第三方补偿后的群体羞耻显著大于无补偿和自己补偿。***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4.2.4 第三方补偿未降低群体责任感知

如图 5C 所示，三种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均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责任感知($ps < 0.001$)，表明内外群体主效应显著，实验情景在三种补偿条件下均可以诱发群体责任感知。对三种补偿条件下内外群体的责任感知差异进行比较发现，第三方补偿条件下的群体责任感知(1.13 ± 0.0.14)并未显著小于无补偿条件(1.19 ± 0.12)，$F(1, 127) = 0.11$，$p = 0. 74$，表明第三方补偿未能降低个体对内群体道德违反行为的责任感知；却显著大于自己补偿条件(0.82 ± 0.09)，$F(1, 127) = 8.07$，$p = 0.005$，$\eta^2_p = 0.06$，表明自己补偿可以降低其对伤害行为的责任感知，第三方补偿在降低群体责任感知上不能代替自己补偿（见图 5D），同实验一和实验二一致。

4.2.5 第三方补偿能诱发群体羞耻

数据模式跟实验一和实验二一致，如图 5E 和 5F 所示，只有在第三方补偿条件下，内群体的伤害行为才会比外群体的伤害行为诱发更强的羞耻情绪，$F(1, 127) = 118.85$，$p < 0.001$，$\eta^2_p = 0.48$，表明第三方补偿能够诱发内群体成员的羞耻情绪。

4.2.6 小结

实验三采用贴近日常生活情景的材料，在非大学生群体被试上进一步检验了实验一和实验二结果的稳定性。实验结果同实验一和实验二一致，进一步说明了结果的稳定性。

5 总讨论

5.1 自己补偿能降低内疚主体自身的群体内疚情绪

以往研究主要强调内疚的亲社会属性如何促进对受害者的补偿(Brown & Cehajic, 2008; Manzi & Gonzalez, 2007)，很少探讨补偿行为对内疚主体自身的影响，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内疚所诱发的补偿行为对内疚主体自身的影响。该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探讨了群体内疚如何影响内疚主体的道德情绪和道德认知。三个实验一致发现自己补偿能够显著降低群体内疚和群体责任感知，且不会诱发群体羞耻情绪；第三方补偿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群体内疚，但第三方补偿不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还会诱发群体羞耻。该结果表明自己补偿和第三方补偿对内疚主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说明内疚所诱发的亲社会属性对内疚主体自身也是有益的。

来自第三方的补偿也可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如果内疚所诱发的补偿行为动机只是为了受益于受害者，那么对内疚主体来说，第三方补偿应该与自己补偿等效。然而，研究表明，自己补偿后的内疚显著小于第三方补偿后的内疚，说明内疚后的补偿行为也会对内疚

主体自身产生影响。这提示内疚后的补偿也是内疚主体调节情绪的一种方式。根据自我调节理论，个体在面临内部冲突或不一致时，会通过调节自身的行为、情绪和认知来恢复内部平衡(Bandura, 1991a; Bandura, 1991b)。在上述研究中，内疚主体在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违反行为后，会产生内疚情绪，因为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内部的道德准则不一致。为了恢复内部平衡，他们选择进行补偿行为，以调节内疚情绪和道德认知。补偿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策略，通过行动来改变当前的状态和情绪(Mandel et al., 2017)。通过补偿行为，内疚主体试图修复他们的道德准则，减轻内疚情绪。

第三方补偿后的内疚情绪大于自己补偿后的内疚。第三方补偿是指来自第三方旁观者的补偿行为，内疚主体并不直接参与其中。根据自我调节理论，自我调节过程需要个体参与并主动采取行动(Bandura, 1988)，而第三方补偿条件下内疚主体缺乏这种主动参与，因此其对内疚的调节效果可能相对较弱。补偿行为作为一种道德修复的努力，既是一种道德行为，也是一种自我惩罚方式（朱睿达 等，2014; de Vel-Palumbo et al., 2018）。第三方补偿只涉及对受害者的利他行为，没有对内疚主体的惩罚，因而其对内疚的调节弱于内疚主体自己补偿。该结果提示自己补偿在内疚主体内疚情绪调节中的重要性，内疚主体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自我惩罚来实现内心的平衡和自我宽恕，而依赖外部补偿可能无法满足这种内在需求。这也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呼应，即内疚主体倾向于通过自我惩罚来减轻内疚情绪(Freud, 1929)。

5.2 自己补偿能能降低内疚主体的群体责任感知

内疚情绪作为一种心理态度，不仅仅是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也在认知层面上反映了个体需要为道德违反行为承担责任(Wiener et al.,1995)。责任感知是内疚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基础（Koban et al., 2013; Li et al., 2020; Yu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也检验了补偿行为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内疚主体对伤害行为的责任感知。结果发现内疚主体自己补偿可以降低群体内疚，也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而第三方补偿能降低群体内疚，但不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

第三方补偿不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可能是因为责任感知往往与道德判断紧密相关。个体通常会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评估自己或所属群体是否应对不当行为负有责任。这种道德判断是一种内在的、客观的认知过程，反映了主体和事务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即内疚主体应当为道德违反行为受谴责的程度(Hoffman,1982)。譬如，在 Yu 等 (2014)关于内疚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和对家一起完成一个猜点任务，不管是被试错还是对家错，对家都会受到电击。结果发现被试会依据其对伤害行为的贡献水平来决定其内疚水平，被试需要为伤害行

为承担的责任越多，感受到的内疚越强(Yu et al., 2014)。第三方补偿条件下，对受害者进行补偿的是第三方旁观者而非道德违反者，道德违反者和道德违反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并没有因为第三方的补偿发生变化，因而不能影响内疚主体对责任感知的评估过程。那为何第三方补偿未能降低群体责任感知，却降低了群体内疚？责任感知是道德主体对其应当为道德违反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评估，反映了道德主体与道德违反者行为之间的因果连接(Hoffman,1982)。相比于责任感知，内疚情绪则更为偏向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除了责任感知，伤害强度、社会认同、道德标准和外部因素都会影响群体成员对群体内疚的感受和程度（e.g., Branscombe et al., 2002; Iyer et al., 2003; Li et al., 2020）。譬如，给予受害者的伤害越强，被试感受到的内疚也会越强（Branscombe et al., 2002）。第三方补偿条件下，受害者能够从第三方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从而降低所受的伤害。受害者伤害程度的降低，也会降低内疚主体由此感受到的内疚情绪。因而面对内疚情绪这种主观的情绪感受，来自第三方的补偿可以通过降低受害者的伤害而降低内疚主体的负性情绪体验。鉴于第三方补偿并不能降低内疚主体对伤害行为的责任感知，诱发内疚产生的认知基础并未消除，我们推测第三方补偿只能短时间缓解内疚主体的内疚情绪，之后可能会再次经历内疚情绪。

5.3 第三方补偿会诱发群体羞耻

面对内群体的道德违反行为，群体内疚和群体羞耻是个体经常体验到的两种自我意识情绪(Branscombe, et al., 2004; Gunn & Wilson, 2011; Lickel et al., 2004)。群体羞耻除了需要群体成员在认知上意识到其成员的行为、态度或信仰被视为不当或负面，还涉及不道德行为对自我的负面评价，他人对群体的行为或特征发表负面评价均会触发群体成员的羞耻情绪。因而，相比于群体内疚聚焦于共情受害者的伤害，群体羞耻更为强调由消极的群体形象诱发的负性情绪体验(Branscombe et al., 2004)。他人在场或内群体的道德违反行为被外界评价，会显著增强负性事件诱发群体羞耻的可能性（Tangney et al., 2007)。Robertson 等（2018）就指出，羞耻的真正诱因是他人潜在或实际的贬低，即使个体没有做出伤害他人或社会的不当行为(Robertson et al., 2018)。来自第三方的补偿一方面会让群体成员面临群体不道德行为被曝光和群体形象受损的风险，还会让群体成员面临第三方对自我和群体形象潜在的负面评价，这些威胁都可能会让群体成员产生羞耻情绪。而当内疚主体自己补偿时，一方面不用面临道德违反行为暴露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内疚主体还可以感受到自己在道德恢复方面的积极努力，因而内疚主体自己补偿不会诱发羞耻情绪。

此外，以往研究也发现羞耻比内疚涉及更多的自我参照过程 (Zhu et al., 2019)。群体成员通常会将自己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特别是在群体形象和道德行为方面。如果群体成员在比较中知觉到自己所属群体在道德行为和群体形象方面不如其他群体，也会让群体成员感觉到自我和群体形象受损，从而产生羞耻情绪。第三方补偿条件可能会增强内疚主体的社会比较行为，即将内群体与第三方进行比较，并在社会比较中感受到自己群体不如其他群体，产生对所属群体的否定和消极评价，从而感到羞耻。

群体羞耻跟群体内疚一样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绪(Branscombe et al., 2004; Gunn & Wilson, 2011)。以往采用情景想象范式的研究常常发现内群体成员在经历负性事件时既会体验到群体内疚，也会体验到群体羞耻(Dresler-Hawke, & Liu., 2006; Harvey, & Oswald., 2000) 。虽然很多研究发现群体羞耻和群体内疚的产生机制是不同的，但二者很多时候又很难区分。我们的研究发现第三方补偿可以有效的诱发群体羞耻情绪，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区分群体羞耻和群体内疚，以深入理解群体内疚和群体羞耻的本质。此外，不同文化对第三方补偿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第三方补偿诱发羞耻情绪这一点可能也会有文化差异，后续研究可以深入探索。

5.4 现实意义与不足

作为一种人际间的社会情绪，研究者在关注内疚对受害者的补偿和对受损关系的修复时，也应重视道德违反者的内在情感和自我调节需求。补偿是一种常见的自我调节方式，可以通过补偿行为来弥补道德违反所造成的伤害 (Mandel et al., 2017)。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结果，道德违反者自己补偿才能更有效地降低其内疚情绪及对伤害行为的责任感知。所以，应该为道德违反者提供机会进行补偿和自我宽恕，通过自我参与和主动承担责任等方式来促进他们的道德成长和心理健康，为其提供道德成长的机会。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由于实验一和实验二均采用的是被试内的实验设计，虽然对刺激呈现的序列进行了控制，但条件之间依然可能会存在干扰，后续可以做一些被试间的实验，来避免这种干扰。

6 结论

本研究表明，内疚诱发的补偿行为不仅对受害者有益，同时也对内疚主体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是内疚主体自我调适的一种方式。通过补偿，内疚主体能够减轻内疚情绪、降低责任感知，并减少羞耻的出现。这一发现展示了内疚的双重影响，既包括对受害者的关注和补偿，也涉及到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调节和恢复，扩展了我们对内疚亲社会属性的理解。

参考文献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596−612.

Bandura, A. (1988). Self-regulation of motivation and action through goal systems. *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44*(1988), 37−61.

Bandura, A. (1991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elf-regul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248−287.

Bandura, A. (1991b). Self-regulation of motivation through anticipatory and self-reactive mechanisms. In R. A. Dienstbier (Ed.), *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38, pp. 69 –164).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Baumeister, R. F., Stillwell, A. M., & Heatherton, T. F. (1994). Guilt: an interpersonal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2), 243−267.

Bedford, O., & Hwang, K. K. (2003). Guilt and shame in Chinese culture: 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and identit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2), 127−144.

Branscombe, N. R., Doosje, B., & McGarty, C. (2002).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guilt. In D.M. Mackie & E.R. Smith (Eds.), *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 *Differentiated Reactions to Social Groups* (pp. 49–66). Philadelphia, PA: Psychol. Press.

Branscombe, N. R., Slugoski, B., & Kappen, D. M. (2004). The measurement of collective guilt: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In N. R. Branscombe & B. Doosje (Eds.), *Collective guil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16–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R., & Cehajic, S. (2008). Dealing with the past and facing the future: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guilt and sham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4), 669−684.

Carpenter, T. P., Carlisle, R. D., & Tsang, J. A. (2014). Tipping the scales: conciliatory behavior and the morality of self-forgivenes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9*(5), 389−401.

De Hooge, I. E. (2012). The exemplary social emotion guilt: not so relationship-oriented when another person repairs for you. *Cognition & emotion, 26*(7), 1189−1207.

De Hooge, I. E., Zeelenberg, M., & Breugelmans, S. M. (2007). Moral sentiments and cooperation: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f shame and guilt.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5), 1025−1042.

de Vel-Palumbo, M., Woodyatt, L., & Wenzel, M. (2018). Why do we self-punish? perceptions of the motives and impact of self-punishment outside the labora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8*(6), 756−768.

Doosje, B., Branscombe, N. R., Spears, R., & Manstead, A. S. R. (1998). Guilty by association: when one's group has a negative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4), 872−886.

Dresler-Hawke, E., & Liu, J. H. (2006). Collective shame and the positioning of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Psicología Política*, *32*, 131−153.

Eisenberg, N. (2000).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1), 665−697.

Falk, C. F., Heine, S. J., & Takemura, K. (2014).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minimal group effect.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2), 265−281.

Faul, F., Erdfelder, E., Buchner, A., & Lang, A.-G. (200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 Power 3.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1*(4), 1149−1160.

Freud, S. (1929).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 *16*, 209−231.

Gaertner, S. L., Mann, J. A., Dovidio, J. F., Murrell, A. J., & Pomare, M. (1990). How does cooperation reduce intergroup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4), 692−704.

Gunn, G. R., & Wilson, A. E. (2011). Acknowledging the skeletons in our closet: the effect of group affirmation on collective guilt, collective shame, and reparatory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11), 1474−1487.

Hall, J. H., & Fincham, F. D. (2005). Self-forgiveness: the stepchild of forgive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4*(5), 621−637.

Harvey, R. D., & Oswald, D. L. (2000). Collective guilt and shame as motivation for white support of black program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9), 1790−1811.

Haslam, N., Rothschild, L., & Ernst, D. (2000). Essentialist beliefs about social categ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1), 113−127.

Hoffman, M. L. (1982).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empathy and guil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 (pp. 281−313). Elsevier.

Iyer, A., Leach, C. W., & Crosby, F. J. (2003). White guilt and racial compensation: the benefits and limits of self-focu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1), 117−129.

Iyer, A., Leach, C. W., & Pedersen, A. (2004). Racial wrongs and restitutions: the role of guilt and other group-based emotions. In *Off White: Readings on power, privilege, and resistance* (pp. 345−361). Routledge.

Izard, C. E. (Ed). (1991).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Johnson, D. W., & Johnson, F. P. (Eds). (1991). *Joining together: group theory and group skills*. Prentice-Hall, Inc.

Koban, L., Corradi-Dell'Acqua, C., & Vuilleumier, P. (2013). Integration of error agency and representation of others' pain in the anterior insula.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5*(2), 258−272.

Kouchaki, M., Gino, F., & Jami, A. (2014). The burden of guilt: heavy backpacks, light snacks, and enhanced mor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1), 414−424.

Li, Z., Yu, H., Zhou, Y., Kalenscher, T., & Zhou, X. (2020). Guilty by association: how group-based (collective) guilt arises in the brain. *NeuroImage, 209*, 116488.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9.116488

Lickel, B., Schmader, T., & Barquissau, M. (2004). The evocation of moral emotions in intergroup contex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llective guilt and collective shame. In N. R. Branscombe & B. Doosje (Eds.), *Collective guil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35–5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 Press.

Manzi, J., & González, R. (2007). Forgiveness and reparation in Chile: the role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ntergroup antecedents. *Peace and Conflict*, *13*(1), 71−91.

Mandel, N., Rucker, D. D., Levav, J., & Galinsky, A. D. (2017). The compensatory consumer behavior model: how self-discrepancies drive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7*(1), 133−146.

Radzik, L. (2001).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duties to respond.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7*(3), 455−471.

Robertson, T. E., Sznycer, D., Delton, A. W., Tooby, J., & Cosmides, L. (2018). The true trigger of shame: social devaluation is sufficient, wrongdoing is unnecessar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9*(5), 566−573.

Steele, S. (1990). White guilt. *The American Scholar*, *59*(4), 497−506.

Tajfel, H., & Turner, J. C. (2004).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276−293). Psychology Press.

Tangney, J. P. (2003). Self-relevant emotions. In M. R. Leary & J. P. Tangney (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pp. 384−400). The Guilford Press.

Tangney, J. P., Stuewig, J., & Mashek, D. J. (2007).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345−372. doi: 10.1146/annurev.psych.56.091103.070145.

Teroni, F., & Deonna, J. A. (2008). Differentiating shame from guilt.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3), 725−740.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 Wetherell, M. S. (Eds).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basil Blackwell.

Watanabe, E., & Ohtsubo, Y. (2012). Costly apology and self-punishment after an unintentional transgressio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0*(3), 87−105.

Wiener, R. L., Pritchard, C. C., & Weston, M. (1995). Comprehensibility of approved jury instructions in capital murder cas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0*(4), 455−467.

Yu, H., Hu, J., Hu, L., & Zhou, X. (2014).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neural bases of interpersonal guilt and compensa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8), 1150−1158.

Zhu, R., Feng, C., Zhang, S., Mai, X., & Liu, C. (2019). Differentiating guilt and shame in an interpersonal context with univariate activation and multivariate pattern analyses. *NeuroImage, 186*, 476−486.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8.11.012

Zhu, R. D., Zhang, S., Shen, X. Y., & Liu, C. (2014). Self-punishment: contributing factor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research prospect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2), 1935−1943.

[朱睿达, 张燊, 申学易, 刘超. (2014). 自我惩罚: 影响因素, 模型与展望. *心理科学进展, 22*(12), 1935−1943.]

The Effects of Compensatory Behaviour on Group-based Guilt, Group-based Responsibility, and Group-based Shame in Moral Transgressors

LI Zhiai[1], XU Mengsi[3], ZHANG Li[2]

([1]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3]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Guilt and compensation have long been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emo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how the prosocial attributes of guilt promote moral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 victims. They have not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how the guilt-induced compensation modulates moral transgressors' moral emotion and moral cognition. If guilt-induced compensation is solely aimed at compensating the victims, it would be equivalent for the transgressors whether the compensation to the victims comes from themselves or from a third-party. If compensation behaviour also has an impact on the transgressors themselves,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would differ from self-compensation. To examine this issu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how moral compensation affects moral transgressors'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perceptions through group-based guilt.

Experiment 1 (n = 213) utilises a 2 (Group: In-group vs. Out-group) × 3 (Compensation Type: None-compensation *vs.*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vs.* Self-compensation) within-subject design, employing a scenario imagination method to induce group-based guilt. Experiment 2 (n = 105) builds upon the first experiment by using a group-base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aradigm to induce group-based guilt within a laboratory setting. Additionally, it quantifies the amounts of third-party and self-compensation to eliminate the potential confounding effect of compensation quantity. Experiment 3 (n = 128) further exami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results from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in non-collegiate population. The experimental designs of Experiments 2 and 3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Experiment 1.

These three experiments consistently found that compared to the none-compensation condition, self-compens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group-based guilt and the perception of group-based responsibility, without inducing group-based shame.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group-based guilt but to a lesser degree than self-compens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failed to reduce the perception of group-based responsibility and even elicited group-based sham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self-compensation and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on guilt, responsibility, and shame suggests that guilt-induced compensation behaviour not only benefits the victims but also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ransgressors themselves, serving as a form of self-regulation. Through compensation, transgressors can alleviate their feelings of guilt, reduce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iminish the occurrence of shame.

Previous research has predominantly regarded guilt as a negative emotion characterised by feelings of guilt and self-blame, emphasising its prosocial attributes towards victims while overlook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that transgressors may derive from guilt-induced prosocial behaviour.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compensatory behaviour triggered by guilt not only benefits the victims but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nsgressors themselves, serving as a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 Through compensation, transgressors can alleviate their feelings of guilt, reduce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iminish the occurrence of shame. This finding demonstrates the dual effects of guilt, encompassing both concern and compensation towards victim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one’s own psychological state, thereby expa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social attributes of guilt.

Keywords self-compensation,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group-based guilt, group-based shame, group-based responsibility